

移民岁月

第九期

YI MIN SUI YUE

各地移民到宁夏

刘天明

1958 年至 1960 年，宁夏接收上海、北京、河南及天津、南京、安徽、山东等地移民 6 万余人（包括家属）。宁夏对这些移民采取了分散插社和集中安置等形式，安置在农村人民公社 3 万余人；集体安置各国营农牧场及水利工程队 2 万余人；安置在工业、交通、文教、卫生、商业等部门 1 万余人。另外移民的干部、职工串联原籍的亲友来宁落户 1 万余人，全区安置自流人员 13 万余人，3 年中宁夏共接收安置 20 万余人。这些外来人口基本安置在黄河灌区各市县，占黄河灌区总人口的 26.9%。

上海移民大部分是生产自救性质的—些街道小工厂和生产场组的工人及家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和其他类型的城市贫民。1958 年迁入 1.8 万余人，以后陆续迁入，至 1960 年年初，上海移民达 3.1 万人。在移民安置方面，对以厂组为单位集体迁入的移民，宁夏采取了在不打乱原厂组的基础上，安置到各县城镇，继续设厂组从事生产自救。对其他类型的移民，有些安置了相应的工作，有些则安置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北京移民主要是城市贫民，也有一部分来自生产教养院，3 年中共接收安置 14080 人，大部分分散安置在农

村，编成生产组从事农业生产。河南移民全部是农民，1957 年至 1958 年由民权、郸城、睢县等县集体迁移来的，共计移民 16861 人。这批移民在 1958 年年底前已安置完毕，采取“大分散、小集中”的办法，在不打乱原迁出地乡、村的情况下，集中安置在原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区的各县城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天津、南京、安徽、山东等地的移民主要是学生和社会青年，总计 7800 余人。

1960 年，有些移民在经济困难时期没能巩固下来。截至 1961 年 5 月底，河南移民中许多人外流新疆、内蒙古等地找工作，少数人返回原籍，外流返籍人数 13488 人，占河南移民总数的 79.99%；北京移民返籍人数 9600 人，占北京移民总数的 70.99%；上海移民返籍 8460 人，占上海移民总数的 27.29%；天津、南京、安徽、山东等地移民返籍 740 人，占移民总数的 9.5%。

由于三门峡水电站的建设问题，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与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商定，从 1956 年起，将三门峡上游陕西库区内的农民迁往宁夏的银川专区和吴忠回族自治区落户。移民采取县与县对口安置，保留原迁出地社队的建制，依照原社队集中安置，先派移民先遣队到宁夏集中建房，待房屋建好后再迁家属。从 1956 年 5 月至

1958 年年初，银川专区和吴忠回族自治区州共接收和安置陕西库区移民 31529 人。后由于三门峡水利工程规模压缩，一些社队不再成为水库淹没区，移民也即停止。一些移民遂产生返籍想法，并串联其他移民一同返籍。1957 年 7 月，移民聚众请愿，要求返回陕西。是年 8 月，银川专区 8 县除尚有 4891 名移民留在宁夏继续从事生产外，返回陕西的移民已达 7162 人，占当时银川专区移民总数的 60%。为此，宁夏各县分别派人到移民迁出地的朝邑、潼关、大荔、华阴等县移民办公室了解情况共同做移民的思想工作，移民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大部分移民又重新返回宁夏定居，新的移民也开始继续迁入宁夏。当年银川专区 10 月至 11 月底返回宁夏的移民有 5162 人，新迁移民 5056 人。1959 年 4 月，陕西移民又开始串联返籍，1960 年移民返籍又形成高潮。由于 1960 年属于全国性的经济困难时期，陕西籍移民到宁夏后，仍无法摆脱生活的“低标准”，许多移民徘徊于陕西、宁夏两地之间，处境艰难。据 1961 年统计，返回陕西的移民已达到 9400 余人，生产条件较差的陶乐县，返籍移民达 4655 人。

1962 年 3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

民委员会委派干部赴陕协商解决陕西移民问题。经双方研究决定，对移民返陕的有关问题作如下处理：一是凡属移民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口粮、籽种、饲料，由返陕移民带回。由国家供应口粮的生产队，宁夏按口粮供应标准将指标拨给陕西（具体调拨手续由两省、区粮食部门协商解决）。对移民返陕途中无口粮者，由宁夏从本人供应指标内给予解决。移民返陕后，与当地口粮供应标准相差的部分，由陕西负责供应。二是返陕移民的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凡属移民自有部分和国家投资购买部分，返陕时允许其—律带回；凡属从当地社队平调而调剂给陕西移民的牲畜、农具，因涉及移民与当地群众共同利益问题，应妥善处理，如调出的社队牲畜、农具多，经做工作群众仍不同意由移民带去，可以不带。三是返陕移民在宁夏的集体或个人所有的房屋，均不得拆除，由宁夏合理作价并付给价款。移民返陕后建房所需木料等物资，由陕西省另行研究解决。四是返陕移民所需路费、运费，由宁夏负责解决。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移民陆续返陕。截至 1962 年初，陕西移民全部返回原籍，陕西移民工作结束。

总工程师的人生经历(二)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长城机械铸造厂要适应市场经济，必须提高技术水平。1986 年从日本引进了树脂生产线。这种工艺，当时在我们国家还不多，现在已经很普遍了。产品出口，首先考虑日本市场，之后是美国市场、意大利市场、新加坡市场、韩国市场，形成了国内和国外市场的互补。在搞铸件出口的过程中，长城机械铸造厂迎来了一个体制的改革——合资。之前向部里要钱要不来，地方银行贷款不给他们办，现在 1000 万都好办了。由于铸件的出口，他们就走了合资发展这条线，日本川口市须崎旗铸工所，厂子不大，但很有诚心，1994 年实现了和日本的合资。一个是走日本市场，一个是拿钱来。和日本川口市须崎旗铸工所签协议有一条就是日方资金到位合同生效，就是你得拿钱来。1000 万到位后，他们把第二个铸造厂房建成了，而且当年满负荷生产，设计的产量年产 8000 吨。蔡老说：“原来我们通过机械建筑工程公司出口，很麻烦，外汇我们拿不到手。最后我们就争取出口政策。”由蔡老到经贸部办理自营出口，那时候叫经贸委。当时他们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两万吨左右的规模，蔡文礼他们有底气了。办理自营出口时，经贸委说：“可以给你批准，但是你得保证年

出口额达到 400 万美元。”蔡老知道得先答应，不然不给你批呀。自营出口书批下来以后，当年出口额达到 800 万美元，翻了一番。

1994 年合资以后，长城机械铸造厂生产就达到一个良性发展阶段。国外市场有那么七八家，产量已经超过两万吨。国家当时减免合资企业关税，国家这个政策也使他们有了后劲，企业也有点钱了。从合资以后，也要考虑提高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蔡老说：“当时孙总在我们的董事会里达成了共识，他还邀请宁夏大学的法学教授给我们讲课，关于依法治厂，那时候全国还没有。所以孙文靖厂长治厂的理念比较超前。”在技术上，由于实现了和日本的合资，起到了两个推动作用，厂领导班子到日本考察，看他们和人家的差距究竟有多大。蔡老是搞技术的，通过日本考察，发现不是差一点，差距非常大。孙厂长说：“老蔡，你看人家这铸件，你能干出来吗？”蔡老说：“日本人能干出来，我们中国人应该能干出来。”他们还和日本一个铸铁协会参观他们的厂子，当谈到出口的话题时，日本人说你们也要出口，中国出口就是那个上下水井盖。这话刺激了蔡老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所以回国就

要争这口气，首先是做日本的铸件。蔡老说：“那时候我们做的就是世界比较有名的日本山崎马扎克公司的铸件，就是那个小巨人的投资方，世界排名第一位，我们专给他干铸件，难度是挺大的。刚开始谈铸件出口的时候，是通过机械建筑公司，连机械建筑公司都看不起我们，你们宁夏这厂能做了吗？他们给山东干，给杭州做，就不给我们做。我跟机械部晃司长比较熟，后来就试着给我们做了。”

小巨人铸造件生产有个过程。为做小巨人铸件，他们又引进了英国的专用铸造生产技术，他们抓技术，而且抓世界顶尖技术，英国的专用铸造生产技术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的。当时引进这项技术，美国马上订货，他们比较认可这个。这时候，长城机械铸造厂实现技术的跨越。这一走出去，他们就忙不过来了，尽量做国外的订单，价格高呀。包括做日本的、新加坡的。当时的出口价格是 1300 美元，国内的赚太贵。所以他们就做国外的，他们产品的出口量达到 80%，1995 年、1996 年基本达到这个量了。这时候出口也赚钱，他们每年能赚到 2000 万，赚三五千万就是利润比较好的时候。他们这个班子就是开拓国内市场，开发国外市场，合资实现了企业

的跨越。

1999 年，由重工厅的厅长陈德祥带队去日本考察。参加者是大河机床厂和长城机械铸造厂，参观了日本的有关机床厂。当时，山崎马扎克公司就提出要在宁夏建设一个小型的机床厂，就是试探性的。之后，山崎马扎克公司派了一个庞大的考察团，大概十来个人，考察了大河机床厂和长城机床。长城机械铸造厂就干铸件，他们不干机床。日本人考察了几天，正好是一个礼拜天，长城机械铸造厂孙总给蔡老打电话，要他到厂里开董事会。蔡老说：“礼拜天开什么董事会？”孙总说：“日本考察团最后态度有点变，马扎克公司谈了个基本观点，说他们看了长城机床厂和大河机床厂生产模式和管理方式，与他们想象的差距太大。”山崎马扎克公司认为这两个厂当时 4000 人，他们要建这个厂有 100 人就够了，那些人给谁？所以日本人提出来，要想做，就与长城机械铸造厂做，当时就是长城机械铸造公司吧。蔡老说：“我们是干铸件的。”日本人说：“技术的问题我们马扎克公司包了，看好的就是你们的理念。”一直谈到后半夜，这事蔡老他们之前根本没想过，蔡老他们干小巨人这个公司就这么干出来了。

（薛正昌 杜恩东 整理）

教育就是感化

——记吴忠师范学院支宁教师赵轶卿

周瑞娟

一片赤诚育桃李，三尺讲台写人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教师是最让人尊敬的职业之一。在教书育人人的征途上，教师就是守护在学生身旁的红烛，是学生人生旅途中的路标。他们用生命点亮了学生的人生梦想。

赵轶卿，吴忠师范学院的退休教师，1964 年从河北到宁夏青铜峡执教。教书育人 30 多年，她视学生如己出，如亲人，用自己“教育就是感化”的理念，为学生营造了因材施教的快乐学习氛围。她用自己的人生魅力和奉献精神，为学生树起了成长的路标，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师范类学生。赵老师说，“来宁夏，当老师，今生无悔。学生们延续了我对第二故乡宁夏的爱。如有来生，我还做老师。”

教书的天职是育人

在赵老师职业生涯中，最让她记忆犹新的是 1978 年青铜峡县全县作文大赛。当时她在青铜峡一中代两个班的语文。经过初赛、复赛到决赛，从全县参赛的 300 多篇作文中选出 32 篇获奖作文，赵老师教的两个班，有 28 名学生的作文包揽了比赛的一、二、三等奖，占到获奖总数的 87%。这次作文比赛后，赵老师的语文教学轰动了整个吴忠地区的教育界。

赵老师当了 24 年的班主任，她和

自己的每一届学生都建立了真挚感情。她的教学理念是因材施教，根据每个孩子的学习程度，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有一次，她批改作文时，发现学生刘岩松作文里一个段落写他在铁道上救人的情节不实。她把刘岩松叫到自己的身边，告诉刘岩松“作文先做人”的道理。刘岩松在赵老师循循善诱的教育下，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赵老师的指导下，刘岩松重新写了一篇作文。后来刘岩松到深圳工作。2014 年回银川探亲，他专程看望赵老师时说：“老师的话，成为我一生做事的一把标尺。”医者仁心，大爱无疆，成为刘岩松当医生一生遵守的人生信条。

2006 年，青铜峡一中 80 届的同学聚会，有一位已到中年的学生跪倒在赵老师面前，感谢她的教育之恩。这位学生叫王树民，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拉扯他和两个弟妹。因为母亲上班，疏忽了对王树民的管教。王树民上课不听讲，扰乱课堂纪律，还经常和社会上一些小青年打架，受到学校的处分。为了让他继续上学，母亲带着他一个班一个班地给班主任说情，可是哪个班主任老师都不愿意接收。后来，王树民的母亲找到赵老师。赵老师知道，如果收下这个孩子，将给自己的教学工作带来一定的负担，如果不留这个学生，就会为他将来的成长留下隐患。赵老师说，当时，王树

民只有 15 岁，如果不要他，让他流落到社会上有可能就毁了这个孩子。王树民到赵轶卿班上后，她给王树民补语文课，帮助他树立自信心，还联系数学老师为他补课，后来王树民慢慢改掉了打架斗殴的坏习惯。赵老师还和王树民的母亲建立了沟通机制，定期到家里做家访，“家庭教育必须和学校教育形成合力，才能把学生的教育做好。这其中老师的作用很关键。不能等孩子出了问题才找家长，那是推卸责任。”在赵老师的帮助和感化下，王树民获得进步，一直坚持读到初中毕业。后来成为青铜峡铝业厂的一名工人。

赵老师常说：“每个学生在不同的环境长大，性格和学习程度都会有所差异。就好比花木，有木本植物，也有草本植物，有的长得慢，有的长得快，剪枝和浇水的方法也要有所区别。不能用一种方法，一个标准对待每一个学生。必须因材施教，否则，对不起学生。”对学生，爱和责任一样都不能少，赵老师一生都这样要求自己。

为师范生树立育人典范

因为赵老师教学业绩突出，1982 年，她调到了吴忠师范学校，结束了与丈夫两地分居的生活。来到吴忠师范学校后，赵老师一人代 8 个班，教学生教育学、心理学、语文等课程。1986 年，

赵老师带的第一届毕业班的学生开始实习。8 个班 400 多学生，到吴忠的高湖、金积和板桥等乡镇中学实习。每一个学生试讲时，她都认真做记录，指出学生的问题，逐一做出示范。实习的学生分布在不同的乡镇，赵老师每天骑自行车奔波在各乡镇的中学。指导、示范，帮助学生解决讲课中出现的问題。实习的 6 个星期，42 天的时间，她几乎没有时间回家照顾孩子。赵老师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学生身上。她要保证所有的学生实习后都能合格地走上教师这个岗位。

“我的一生职业和事业合二为一，我喜欢这个工作。如果有来世，下辈子我还当老师。”给予的越多，收获的越多。生活中的一切获得都源于曾经的付出，赵老师在宁夏 30 多年教书育人的矢志不渝的付出中，在塞上大地收获了最甘甜的果实。

笔者手记：生命的喜悦在于传递解惑，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社会。回望 60 多年前，从祖国各地支援宁夏教育的一大批中小学老师，带来了家乡的文化根脉，使祖国东西南北中的文化在宁夏这片黄土地上聚拢，交融，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们为国家、为宁夏培养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人才。支宁教师是改变当代宁夏文化教育史的人，也是用生命书写宁夏历史的人。（作者单位：宁夏广播电视台）

往事回顾

六盘山上，红旗漫卷西风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宁夏固原市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碑上，镌刻着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名篇《清平乐·六盘山》。

词中所描写的六盘山，古称为陇山、鸡头山，地处宁夏南部黄土高原，平均海拔超过 2500 米，是红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必经之路，也是红军长征时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因此被称为“胜利之山”。

1935 年 8 月 15 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休整了 3 天。8 月 17 日，红二十五军仅以两个连的兵力一举攻克德隆县城，最后与主力部队会合，连夜翻越六盘山，进入甘肃平凉境内。10 月 5 日，红军进入宁夏西吉县境内。当时，国民党军为了堵截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在六盘山一带设置了包括国民党毛炳文两个师、东北军何柱国骑兵部队、门炳岳及西北马鸿宾部队等在内的重兵，形势相当严峻。10 月 7 日，陕甘支队主力沿固原王套、后莲花沟到达六盘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则向东南绕隆德县境，沿小水沟登上六盘山。

仲秋时节，秋风送爽，天字澄澈。在六盘山主峰之一牛盘山顶，六盘雄姿一览无遗，招展的红旗尽收眼底。毛泽东回顾红军纵横十余省、长驱几万里的艰难历程，看到中央红军沿战国秦长城一路东进，即将到达目的地陕北，展望革命前景，顿时感慨万千。一首《清平乐·六盘

山》，既抒写了红军的豪情与气度，也让六盘山为人所熟知。

如今，不少游客慕名来到六盘山，走一走“红军小道”，亲身体验长征的艰难险阻。这条长 2.5 公里的小道，以雕塑群的形式再现了当年红军长征壮举的 18 个主要场景。从山脚沿着红军小道拾级而上，“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经典场景在沿途逐一呈现。

“翻过六盘山，中央和中央红军就彻底地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固原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杜彦荣介绍，六盘山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符号和记忆，它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与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还创作了《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等多首不朽的诗词。这些作品不仅生动记录了红军长征辗转曲折的行动轨迹，更让长征精神以文字的方式流传了下去。

《清平乐·六盘山》诞生之后，在军民中广为流传，极大地鼓舞了斗志。后又历经几次修改，最终形成了今天人们熟知的这个版本。如今，在宁夏的六盘山长征纪念馆等纪念景点，各党政机关及高校里，经常可以看到这首《清平乐·六盘山》。

“《清平乐·六盘山》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是毛泽东留给宁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一名句，已经融入宁夏人的血脉之中，激励着宁夏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勇前进。”杜彦荣说。

（据《光明日报》）

吴大澂三关口筑路碑

马建军 整理

宁夏固原博物馆石刻馆陈列有一组青石质地的石碑，由四块大小相同的碑组合而成，碑身高 127 厘米、宽 304 厘米、厚 10 厘米，座高 12 厘米、宽 31 厘米、厚 8 厘米。碑的正面刻字，碑文由正文与跋两部分组成。正文由吴大澂书写。跋后为杨重雅书写。

吴大澂（1835 年至 1902 年），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意斋，江苏吴县人。清同治六年（1867 年）考中进士，授命编修《穆宗宪朝实录》（清穆宗爱新觉罗毓祿），名震朝野。后出为陕甘学政，陕西一带发生饥荒，他办理赈务，深得人心。光绪六年（1880 年），朝廷授他三品衔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边防事宜。他亲自勘察地界，为吉林东部国土被俄占领一事，向俄提出了抗议。光绪十一年（1885 年），再次赴吉林，会同浑春副都统、边务帮办依克唐阿与沙俄再次会勘东部边界。次年，他们与俄方勘界代表、滨海省省长兼司令巴拉诺夫在俄境内岩柯河举行了勘分边界会谈。在会议中他据理力争，收回了被俄占领的珲春黑顶子百余里的土地，并争得了中国船只在图们江口的航行权。光绪二十年（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时任湖南巡抚，“请率湘军赴前敌忧”。次年他作为湘系军队副帅出关抗日，但由于将令不一与军队腐败，全军溃退。他惭愧无比，“愤湘军尽覆，拔剑欲自裁”。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朝廷“降旨革职，永不叙用”。就这样他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吴氏学术与书法造诣颇深，精于金石学和古文字学，曾搜集钟鼎、玺印、陶器、货币上的文字，撰写了《说文古籀补》。又集录所藏各家彝器铭文拓本为《意斋集古录》，另撰有《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考》《意斋诗文集》等，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他的晚年，生活艰难，贫病交加，经常“售书食古铜器以自给”。在书法上，他能写善画，擅长篆书，并吸收钟鼎铭刻情意，直接学习古器物书法，中年后掺以古籀文，且喜用楷体作书，开创书法史上的先例。但是他的书法作品在全国流传下来的寥寥无几，仅见的有故宫博物院《篆书诗轴》和勘查东北边界时撰写的“龙虎”二字，均为篆书，风格比较短促整齐。

三关口筑路碑，是吴氏就任陕甘学政期间，路过此地时

书写的。组碑整体看上去颇有气势，前三块每块竖刻五行文字，第四块刻三行全文完落后落空，只是在近边处落款。落空的部分刻有杨重雅后来补写的跋后。碑文内容主要颂扬当时担任庆、泾、平、固观察使的湖南邵阳人魏光燾督将士拓宽、修平丝路关隘三关口的一段道路，方便行人，沟通东西的功绩。也是反映他书法艺术成就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具有显著的特点：一是体现了清代隶书对汉隶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综观清人书写隶书，远宗汉隶，但并不一味摹挾汉隶，在书写过程中，以自己的意趣，极尽变化之能事，或取篆籀笔势，或运用行草笔意；或掺以魏碑、唐楷之法，也有熔真草隶篆于一炉者，真可谓神奇变幻，不可方物。吴氏固于影响，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在书写该碑时，把篆书笔势有机地揉合于隶书之中，使字体处处带有篆书意韵，美观大方，道劲有力。二是整体结构排列打破了明清以来隶书的排列风格。明清以来隶书作品，字体扁方匀整，波磔划一，竖有列、横有行、列间挤、行间宽，规模整齐划一。吴氏没有受其束缚，在排列结构上，每块碑竖排五行文字，满行为十二字，有些行只有十字或九字，每个字体大小、长短、扁方均不统一，错落无序，潇洒自如，与传统风格迥然不同。三是落款展现了自己的风格。吴氏善写篆书，但经常用隶书作款，属汉碑中方正平实一路，该碑落款的十一字，在第四块的近边处，笔无篆味、波磔有形、体态匀整均等，集中体现了清人隶书的模式，也是他长期以来形成的属于自己的风格。这些特点显示出了他在书法、文字方面深厚、扎实、凝重的基本功底。

该碑早年镶嵌在距固原县城南 45 公里处的三关口崖上，“文化大革命”时被三关口村群众搬回村里，但是并没有使其受到损坏。1981 年，固原直接学习古器物书法，中年后掺以古籀文，且喜用楷体作书，开创书法史上的先例。但是他的书法作品在全国流传下来的寥寥无几，仅见的有故宫博物院《篆书诗轴》和勘查东北边界时撰写的“龙虎”二字，均为篆书，风格比较短促整齐。

三关口筑路碑，是吴氏就任陕甘学政期间，路过此地时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